

書名：《文弱書生：中國文化語境中“才子”的權力與男性氣概》

作者：宋耕 (Geng Song)

譯者：周睿

出版：香港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頁數：192頁

《文弱書生：中國文化語境中“才子”的權力與男性氣概》(以下簡稱《文弱書生》)由作者本人的英文原著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4年) 翻譯而來, 作者宋耕 (Geng Song) 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他曾先後在澳洲國立大學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 致力於跨文化、跨學科、跨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的性別文化問題, 當中電視文化、性別與性、東亞男性氣概、翻譯及跨文化研究均屬於宋耕的專研領域。關於這一領域的研究, 在此書出版之前, 相關成果較少。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主要有周華山《性別越界在中國》(香港: 香港同志研究社, 2000年) 首兩章《男性研究》, 探討中國男人如何閱讀“男性解放”、“男性特質”的界定、“男性特質”的中西文化差異、後殖民男性研究在中國等議題。此外, 當代女性及性別史權威學者曼素恩 (Susan Mann) 亦提出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領域之中, 我們應重視“男性氣概”、男性的人際關係、性別關係等課題。當中“AHR Forum-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2000年12月) 及“Women’s History, Men’s Studi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2年) 是其代表之作。而 Susan Brownell 及 Jeffrey N. Wasserstrom 合編的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2002年) 也提出了中國歷史之中“男性氣概”被定義為與其他男性進行身體上及精神上的競

爭。該論文集多以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性別研究為主要討論時期,研究主題方面,例如有家庭與婚姻、文學傳統中的性別、身體及性文化等;然而,帝制中國及古代“男性氣概”的討論課題則相對較少。¹ 但以上著述均以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為主,直到雷金慶(Kam Louie)的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2002年;中譯本:《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情況才有改變。該書解釋了在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兩種男性氣質“文”與“武”,為帝制中國、二十世紀前後的中國“男性氣概”研究建立重要的分析框架、理論及研究基礎。宋耕的著作乃繼此之後的又一部力作,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很大的突破,以中國古代文化語境的“文弱書生”為切入點,專門探討“才子佳人”小說中的“才子”形象,分析其“男性特質”的建構。又以中國古代“男性氣概”概念建基於“陰陽”理論為出發點,提出中國與西方文化的男女二元對立現象之差異,展示一種跨文化分析的獨特視角。其後,黃衛總(Martin W. Huang)的《中華帝國晚期的男性構建》(*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於2006年出版,分析了在儒家影響之下明清時期“男性氣概”的建立,並運用儒家典籍、政治論著、小說作品等方面加以探究,討論明清時期“男性氣概”之呈現與“男性憂慮”等課題。

以上三本書出版時間相近,亦互相引用彼此的研究框架與論點進行反思,進一步刺激中國“男性氣概”研究之分析角度及方法的思考,為這一領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成為古代中國/中國“男性氣概”研究的關鍵開拓者,而宋著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在全書的《導論》中,宋耕明確指出是運用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把“文弱書生”作為話語,並進行一種文化解讀及分析。作者強調“文學對男性特質及女性特質的表現(再現)起了重要的作用”(宋耕著,周睿譯:《文弱書生:中國文化語境中“才子”的權力與男性氣概》,頁2。以下引此書,僅注頁碼),而通俗小說及戲曲的“才子”與“佳人”之文學話語,是展現性別表現與構建之中最適的例子。宋耕又認為“才子”之呈現,意味著從男性視角

1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發出男性聲音、闡述理想男性特質，屬於重要的切入方向。除了審視雷金慶所提出的“文”、“武”分析視角，本書亦展示“陰”、“陽”作為主要分析理論與框架的重要性，不只反映男/女的性別內涵，也“能彰顯古代中國性別認同的流動性、政治化”（頁 13）。“陰”、“陽”觀念反映一種權力等級制度，也有助於我們掌握中國同性情愛傳統、同性社交之本質。

第一章《作為文化話語的“文弱書生”》主要介紹“才子佳人”的類型、淵源及流變，對文化話語(cultural discourse)加以界定。有關才子佳人的個案分析，本章主要以《史記》“列傳”中關於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8)及卓文君(前 175—前 121)的記載、《世說新語》中“惑溺”的內容、唐傳奇的作品、元雜劇文本(如《西廂記》)、明清才子佳人小說為主要線索。作者亦再次申述本研究借助米歇爾·福柯於“話語”這一術語所強調的權力、知識、真理之討論方向，繼而審視作為“話語”的“文弱書生”形象與及相聯的社會準則。此外，本書側重於“文化闡釋”，更關注“古代中國權力結構、意識形態及抗爭的可能性與限度”（頁 30）。

第二章《從屈原到張生：雌柔“士”的譜系流變》探討“陰陽”和權力的議題，故此士人及君主的關係、夫婦關係成為研究的重心。對屈原之作《離騷》所展現對楚國君主的不滿、對自身命運的慨嘆，宋耕認為內容上具有“棄婦”心態，不但具有傳統文人以諷喻手法寫作之慣例，又體現一種女性化特質。又以元代《西廂記》中的張生形象之建構，例如其“男子氣概”及性能力被紅娘調侃為分析角度，展示了如 Kaja Silverman 所提出的“歷史創傷”，箇中張生的女性化形象之構建，委實反映宋元時期文人對朝代轉變及政治邊緣化而感到痛苦、羞恥及焦慮，並在書寫的內容中加以展現。

第三章《文本性、儀式性與“馴柔身體”》強調文本書寫權力與文人“身體修辭”的關係。在科舉制度的設定下，士人被制度所馴服。“士”可分為兩大類，其一處於政治活動的核心，其二是位列邊緣的文人。政治及經濟狀況來判定“士”之身份，並不容易，反而唯一方式是從文本生產者身份去切入及了解。文人的文藝表現，透過自身的身份，構建理想的、流行的、崇高的“男性氣概”，科舉制度下的各種名銜，又進一步把文人階級進行細緻劃分，文人服從於國家，科舉成為“一種身體規訓的儀式化技藝”（頁 62）。

第四章《才子對君子：反諷、顛覆與遏制》以“才子”及“君子”為分析重心。“君子”被視為理想男性，恪守主流意識形態、為官盡心盡力、遵守社會禮儀、克制個人欲望。“才子”有“士”的特徵，又在聲色問題上與儒家倫理有截然不同的特殊形象。私人與公共之間，“才子”與“君子”呈現一種張力。本章所舉出的核心例子，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與父親賈政之相處所產生的衝突、箇中表現的叛逆及顛覆，與“才子”相似；賈寶玉並無積極報考科舉，又展現一種獨特的“男性氣概”模式，寶玉是“對才子的再顛覆”（頁 87）。

第五章《唇紅齒白、面若冠玉：同性情愛與男性身體》以才子形象切入，分析男性身體的審美理想及觀念，並帶出其與同性及雙性情愛傳統的關係。又以中西方對異性戀及同性戀的理解及文化差異作比較，指出有別於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對立，中國歷史及文化則對男性同性戀呈現相對寬容的社會狀況，而“陰陽”理論強調相互轉化、相輔相成，這種性別身份的流動特質，也讓男性在家中居“陽”的主導地位，卻在官場上又轉為“陰”從而忠誠於君主。這些因素，都可能進一步令才子女性化現象帶來可能及條件。此部分以古代“男風”為探究重心，例如君主與男寵、貴族與變童等現象、文學作品中的同性情欲傳統，展示它們與“男性特質”建構、男性身體的密切關係，同時男男關係之呈現，亦與權力關係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第六章《同性社交渴望：英雄氣概、厭女表現與男性間紐帶》指出“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是研究中國古代男性特質的關鍵”（頁 115），男男關係發揮不可或缺之作用，男性把大部分社交生活建立在男性之間的互動。本章主要以《三國演義》及《水滸傳》為例，展現當中男性角色的英雄氣概與厭女表現，甚至呈現只限男性生存的世界，表現“去性別化”現象，如《水滸傳》即為一例。中國文化傳統之中，“男性氣概”之建立取決於“其與政治之間的聯繫”，並非由男女關係去決定（頁 126）。女色常被視為罪惡根源，沉迷於男女之愛亦會對男性間紐帶關係帶來威脅。

本書主題視角新穎，以傳統中國社會中“才子”形象進行專門解讀，作者提出的分析甚具層次，可謂獨具慧眼。本研究為中國“男性氣概”研究的推進，帶來刺激思考之作用，極具參考價值，從而與雷金慶、黃衛總的研究，在“男性氣

概”研究領域內引領風騷，正如李歐梵為其撰寫推薦語所言：“於性別研究及中國研究而言，獨具鑿空之功。”在筆者看來，《文弱書生》更進一步對中國男性史研究建立“鑿空之功”。

中國男性史的研究，仍然極具延伸探討的空間。學者的努力集中在幾方面，包括“男性交友(male friendship)”、“男性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以及“男性氣概(masculinity)”等，當中“男性氣概”的研究確實相對不足。² 雷金慶提倡“文武”分析、宋耕強調“陰陽”理論，都為中國“男性氣概”探究帶來重要的分析方法，成為古代中國/中國“男性氣概”研究的關鍵借鑒作品。有了三位學者開拓“男性氣概”的研究視野，後續的中國“男性氣概”研究，對他們提出的觀點、方法論加以吸取，可以繼續反思三位學者的相關觀點，並探討中國“男性氣概”研究之延伸開拓方向。

《文弱書生》出版以來，啟迪及推動學界出現不同性質的“男性氣概”研究之創新，這二十年內，成果明顯地逐漸增加。主題方面，例如有孟子哲學思想與“男性氣概”、中國小說中的“賣淫”書寫與“男性氣概”、近現代中國戰爭、軍事與“男性氣概”、中華帝國晚期的同性戀與“男性氣概”、中國歷史上“男性氣概”的發展與通論、蛻變中的中國男性（從士大夫到全球化時代）與“男性氣概”、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欲與身體、明清女性聲音與“男性建構”等等。³ 宋耕的《文弱書生》對“男性氣質”研究的推動及影響力，以至對中國“男

2 何宇軒：《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013年第32卷第4期，頁1—10及《漸放異彩：中國男性史之廣續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017年第36卷第4期，頁26—35。

3 例如有 Joanne D. Birdwhistell, *Mencius and Masculinities: Dynamics of Power, Morality, and Maternal Thin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Paola Zamperini, *Lost Bodies: 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王詩穎：《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臺北：“國史館”，2011年）、G. Vitiello,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Bret Hinsch, *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Nicolas Schillinger, *The Body and Military Masculin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Art of Governing Soldier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6)、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轉下頁）

性氣質”學科建設而言,都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此處筆者亦略申淺見,嘗試提出個人的一些想法。

第一、本書把“才子佳人”的研究範圍,定於元明清三代。每章節解釋相關詞彙的源流及重要概念之際,亦盡力附加其他朝代的文獻記載,例如《史記》解釋“才子佳人”的理想原型,又以《論語》說明“君子”的特質等等。本研究常強調“避免非歷史主義”,也可將文本更加“歷史化”,更加注重具體的歷史語境(頁32)。例如分析張生形象之建構,則指出宋元時期文人對朝代轉變及政治邊緣化而感到痛苦、羞恥及焦慮,繼而在“歷史創傷”中有所體會,加以建構相關女性化形象。然而,以相關歷史語境之角度而切入分析明清時期的作品部分,發揮相對不足。朝代轉變,有否影響具體的“男性氣概”建立,也是本研究需要繼續補充說明的部份。如果男性文人是建構“才子”形象的關鍵角色,作者亦期望加強本研究的歷史討論,文人書寫的文集、筆記、家訓等史料的注意及採用,可能也是頗具討論價值的參考文獻,可提供更多的分析面向。本研究的不同章節,於元雜劇徵引最多,明清通俗小說之分析,則主要呈現於《才子對君子》及《同性社交渴望》兩個章節。至於元明清的“男性氣概”分析,可否代表掌握整個帝制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男性氣概”發展,仍有待商榷。

第二、本書強調“才子”話語產生的分析,並對比西方模式,從而掌握中西方文學中理想男性形象及建構之差異。美中不足的是,這分析目標主要呈現在《唇紅齒白、面若冠玉:同性情愛與男性身體》一章,其他章節尚有展開專門討論及補充說明的空間。

第三、《文本性、儀式性與“馴柔身體”》一章強調在科舉制度的設定下,士人被制度所馴服,又會出現“文人階級更細緻劃分”的情況。此部分或可與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相互呼應,進一步展

(接上頁)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欲與身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何宇軒:《言為心聲: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等等。

示這種處於核心或邊緣的文人，他們所承受的“男性憂慮”等問題。⁴

第四、如果才子形象所展現的“男性氣概”是多元化的，英文原著也可考慮採用 *Masculinities* 一詞。此外，到底 *Masculinity* 應翻譯為“男性氣概”、“男性特質”、“男性氣質”、“男性建構”或是其他相關詞彙，學者也有不同的見解。宋耕指出“至今仍是一個不可譯的術語”（頁 xii），此方面學界亦未有普遍認可的譯法。暫時存疑，留待日後查考。

總括而言，《文弱書生》的出版，除了在古代中國/中國“男性氣概”研究發展之中扮演領航的角色，也讓我們見證“男性氣概”研究的生命力，日新又新。

（作者：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何宇軒）

4 Benjamin A. Elma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